

下卷

叶健君 李万青 主编
郭钦 李万青 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讲述外交奇才顾维钧，跨越三个世纪、反对“台独”的中国著名女性宋美龄，曾得到蒋介石欢心又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党籍并解除一切职务的吴国桢，曾蒙毛泽东邀请到中南海划艇游览、毛泽东亲自为其操舟的程潜，曾担任孙中山卫士、后追随蒋介石而又为祖国统一尽心尽力的卫立煌，一度执掌西北军政实权而被称为“西北王”的胡宗南，有“常胜将军”之称的傅作义，曾身兼数职而又被蒋介石剥夺了实权的阎锡山，素有虎狼之性的马步芳等23名“战犯”的人生故事。他们的人生与蒋介石密切相关，却又形形色色，结局各不相同，富有戏剧性。

43名国民党“战犯”命运纪实



大结局

【43名国民党“战犯”命运纪实】

叶健君 李万青◎主编

郭 钦 李万青◎编著



出品人：叶健君

总策划：郭钦

责任编辑：李万青

封面设计：李万青

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五福街

电话：(0731) 5788888

邮编：410005

印刷：湖南新华书店

开本：大32开

印张：10.5

字数：12.5万字

定价：28.00元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结局:43名国民党“战犯”命运纪实 / 叶健君,李万青主编,
李万青,郭钦编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11

ISBN 978 - 7 - 5438 - 5993 - 7

I. 大… II. ①叶… ②李…③郭…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6828 号

大结局——43 名国民党“战犯”命运纪实(上、下卷)

主 编:叶健君 李万青
编 著:李万青 郭 钦

出 版 人:李建国
策 划:章红立

责 任 编 辑:章红立 李雄伟 黎晓慧 洪江水
装 帧 设 计:木鱼视觉设计

出版、发行: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nppp.com>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410005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 1092 1 / 16

印 张:60

字 数:1340000

书 号:ISBN 978 - 7 - 5438 - 5993 - 7

定 价:98.00 元(上、下卷)

目 录

CONTENTS

王世杰：离政赋闲

●王世杰受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大法学教授，后任法律系主任。他所撰《比较宪法》讲义，在北大独树一帜 /001

●抗战后期，王世杰调国民党外交部工作，后任外交部长，负责对英、美两国的外交事务。抗战胜利前夕，王世杰赴西安与中共和谈 /003

●王世杰回忆说：重庆谈判时，我提议政治会议加上“协商”二字，毛泽东、周恩来觉得非常好，很爽快地采纳了 /007

●王世杰临终前给儿女留下遗嘱：切不要在其墓碑上刻上教育部长、外交部长这些官衔，就写“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 /009

顾维钧：孤悬海外

●顾维钧外交生涯中最成功的一幕是参加巴黎和会。他毅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使他在国内外名声大振 /012

●在20世纪中国最激烈的两大政治力量的角逐中，顾维钧最后一段时期的外交生涯不幸与国民党联在了一起 /015

●顾维钧对杜鲁门声明心情十分复杂，他认为，声明中有关台湾主权未定的内容“措辞是粗暴的，简直很蛮横” /020

●顾维钧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中，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023

●顾维钧结束了驻美的使命，也结束了他在外交界漫长的服务生涯。此时，距他首次赴华盛顿担任中国驻美公使已整整40年了 /028

●顾维钧辞去台湾“总统府”资政的职务，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这次完整的9年任期，是他担任公职以来最惬意的时光 /031

●有爱妻相伴，有儿孙绕膝，有健康的身体，有安逸的生活，顾维钧的晚年是幸福的。但是他说：“我的根究竟在中国啊！” /033

宋美龄：跨越三个世纪

●1927年底，蒋介石（中正）与宋美龄联姻，报纸以“中美合作”为大标题进行了报道，意味深长 /036

●西安事变发生，宋美龄力排阻挠，亲赴西安，稳定蒋介石，说服张学良，拜见周恩来，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039

●宋美龄是在美国国会演讲的中国女性第一人，她的魅力令美国人民疯狂，被评选为全美最受景仰的十大女性之一 /045

●宋美龄的美国文化背景，把蒋介石政权与美国政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是蒋介石政权联美反共和依靠美援打内战政策的实际决策人之一 /049

●树倒猢猻散，在高官们纷纷寻找退路远离台湾时，宋美龄却从美国回到台湾岛，回到蒋介石身边，使蒋介石感到莫大的慰藉 /052

●蒋介石病逝，台湾岛已非久留之地，宋美龄赴美休养，逐渐淡出政坛 /056

吴国桢：情萦故国

●南开的两位好友——周恩来、吴国桢：一个成为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参加了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宠臣和干将 /060

●吴国桢精力充沛，有漂亮的仪态，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美式的民主作风，仿佛一位大上海的现代化的民主市长，是蒋介石身边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064

●吴国桢飞往美国西雅图，走上了与蒋介石最后决裂的道路，闹出了沸沸扬扬的“吴国桢案”。一个蒋介石身边炙手可热的人物为什么会和蒋介石分手呢？ /066

●政坛失意的吴国桢返回学界，自费出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美国为何不理解亚洲事务？》。关心大陆发展，准备回国，却突然病故 /071

刘峙：教书为生

●刘峙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中原大战，刘峙凭一股勇气，竟然连战连胜，号称“常胜将军”，红极一时 /074

●蒋介石为了表彰刘峙的“功劳”，特意划光山、罗山、红安、麻城4个县边区各一部分，以刘峙的字“经扶”为名，以新集为中心设立“经扶县” /077

●抗战中，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弃保定而南走，获得了“长腿将军”的称号，为人所鄙视 /078

●蒋介石思前想后，要派一个资格老，又唯命是从的人去守徐州，因此一意决定启用刘峙为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 /080

●刘峙下台后，避走九龙，遭到土匪抢劫，为了糊口，刘峙率家到印度尼西亚以教书为生。回台湾后，深居简出，过起了现代隐士的生活 /085

程 潜：阵前起义

●黄兴逝世，程潜亲写挽联，吊唁黄兴：“公真不淫不移不屈大丈夫，春申噩耗谣传，把剑几回伤往事；我恸立德立功立言多先辈，华夏共和再造，接受两次愧前驱。” /087

●大革命后期，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迅速缉拿蒋介石，由林伯渠转达程潜执行，未料遭到了程潜的拒绝 /094

●抗战爆发后，程潜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当日军自北南下之时，奉蒋介石指令指挥所部在黄河花园口掘堤，“以水代兵”，震惊中外 /101

●程潜参加副总统选举落败，湖南“家长”回湘掌握湖南军政大权 /105

●程潜向邓介松吐露苦衷，说：“我都成了战犯了，还谈什么和平？况且，我们一表示接受中共八条，蒋介石肯定会先拿我们开刀。” /113

●程潜夫人郭翼青见到周恩来总理，鼓起勇气问道：“总理，程潜究竟算什么？我家到底算什么成分？” /119

薛 岳：百岁而终

●蒋介石在上海密谋“清党”，薛岳赶到上海，建议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当反革命抓起来！” /125

●薛岳以对红军围追堵截的赫赫战功，从此扶摇直上，成为蒋介石非嫡系集团的一方诸侯 /127

●万家岭大捷，叶挺盛赞薛岳：“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永垂不朽。” /128

●蒋介石开始决定不守长沙，薛岳说：“长沙不守，军人之取何在？”抗战时期，薛岳一边抗日，一边反共，制造了“平江惨案” /134

●内战失败，薛岳随蒋家王朝撤到台湾，到台湾后看尽脸色，晚年远离世事，终日书房，不管政治，不管闲事，不做媒人 /143

卫立煌：回到北京

●蒋介石将以金寨为中心的几个县边境地区划在一起，设立“立煌县”，以表彰卫立煌“剿匪”功绩 /146

●1943年冬，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经过浴血奋战，打通了中印公路。这是卫立煌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 /153

●谁去守东北呢？蒋介石想来想去，卫立煌算是能打仗的，东北的国民党军多数是当年的远征军，卫立煌与他们有亲密关系，让卫立煌去东北是最合适的了 /157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会回新中国。”卫立煌郑重地对“民革”的同志说 /163

●在讲《论十大关系》第七个问题，毛泽东说：“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169

余汉谋：种菜赌棋

●出身贫寒的余汉谋，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军旅，逐渐为广东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所信任 /175

●两广事变，余汉谋倒向蒋介石，取代陈济棠成为粤军的领袖人物 /179

●广州失陷，余汉谋被讥讽为“余汉无谋”；粤北两次大捷，声誉逐渐恢复，官复原职，更兼任第七战区总司令 /183

●中共策反余汉谋，余汉谋顾虑重重，说：“这是谈何容易的事，纵不顾念自己的历史问题，即对那班特工人员方面，行动上也有许多危险。”不敢弃暗投明 /188

●种菜未容终老去，赌棋时约故人来 /189

胡宗南：死非其所

●身高不过一米六的胡宗南被黄埔军校破格录取，与校长蒋介石认作同乡，从此飞黄腾达，深得蒋介石的器重 /191

●胡宗南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他的部队是蒋最为得力的部队，每有大战，必调其前往 /194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占领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延安，得到了一座空城 /196

●昔日“西北王”沦落为海匪头 /201

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

●绥远抗战，傅作义大胜日寇，毛泽东极为钦佩，说“神为之王，气为之壮” /208

●傅作义赞成共产党的全民抗战和持久战主张，赞赏许多共产党人个人行为，尤其钦佩周恩来，但他不赞成共产主义，甚至“礼送”共产党员出境 /213

●面对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战守不能，走留不成，傅作义内心矛盾之极。他能走上和平解放的道路吗？ /218

●傅作义被中共列为国民党首要战犯之一。他听到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大惊失色，他最担心的是，平津问题和平解决后，能得到共产党的理解吗？ /229

●傅作义在20多年的水利电力部长任内，为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235

阎锡山：孤岛哀鸣

●阎锡山总能望风而动，及时调整自己与其他军阀和中央的关系，“两面见光”、“左右逢源”、“朝秦暮楚”，“中”的哲学运用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238

●阎锡山携手蒋介石攻打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武装，他自编“防共歌”，组织反共组织“好人团”，成立“防共委员会会议”，实行“全民反共”政策，阻止红军东征，均遭失败 /246

●代表山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阎锡山，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双重性质：

既有抗日的一面，又有反共、反人民对日妥协的一面。在抗战前期，前一种性格表现明显；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后一种性格便突现出来 /251

●阎锡山认为，被解放军释放回来的官兵已经在解放区攀下亲戚，结下缘法，已经受过“狐狸精”的迷惑，必须断其归路 /259

●阎锡山吃了败仗之后，异常恼怒，斥责部下：“失败的军人，不是被敌人打死、自杀，就是军法制裁，部下辱骂，社会鄙弃，父母妻子也跟上丢人败兴。” /265

●阎锡山一生喜弄玄机，临终还留下令人费解的遗嘱和数副莫名其妙的自挽联，似乎要留千古之谜，让人去动脑筋 /270

周至柔：仍受重用

●在蒋介石 50 寿辰之日，周至柔令使用美制飞机，在南京上空编成“中正五十”四个字形，取悦蒋介石 /275

●全面抗战爆发，周至柔指挥国民党空军参战。抗战中，国民党空军曾派出飞机 2 架，远飞日本本土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九州各地，散发告日本国民党和告日本外交协会书等传单、小册子共 14 万份，震惊了海内外 /276

●周至柔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任总司令，命令所部采用侦察、运输、扫射、轰炸等手段，积极配合地面部队对解放区疯狂进攻 /279

●周至柔病逝后，台北《中国时报》报道了这一消息，标题颇有意味：“叱咤疆场创始空军实至名归；纵横球场提倡围棋非公莫属。” /281

王叔铭：蒋家甘草

●王叔铭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从苏联回国后，投向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284

●王叔铭升任空军副总司令，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几乎每个战场都有他的身影 /286

●空战失利，王叔铭命令台北“中央社”以比北京同行新华社还要快捷的动作，抢先播发关于台湾空战失利的新闻，这是为什么？ /287

●排解蒋经国父女的僵局，讨蒋孝章的欢心，王叔铭确实颇有一套办法，无论在什么时候，人称“王老虎”的王叔铭，总是有妙方让蒋孝章破涕为笑 /290

桂永清：短命总长

●桂永清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任训练处处长，为蒋介石亲信“十三太保”之一 /292

●桂永清攻击兰封不力，被撤职，但未予深究 /295

●抗战胜利后，陆军出身的桂永清接替陈诚为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上任后，从陆军的老部下中选调一批人进入海军，外界议论为“陆战队下海” /297

●桂永清继周至柔为台湾“参谋总长”，不到两月，便病死任上 /301

杜聿明：接受改造

●杜聿明投考黄埔军校，榜上题名，于右任特赠“安危天下重，博大圣人心”对联一副，加以勉励 /303

●激战昆仑关，杜聿明一战成名。日寇旅团长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中写道：“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更强的军队。” /308

●出征缅甸，指挥远征军，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亲自偕夫人慰问，称赞杜聿明率领的远征军“损兵不损志，败军不败威” /313

●蒋介石吞吞吐吐地对杜聿明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 /316

●淮海大战失败，绝望之中，杜聿明企图自杀，副官从旁一把将手枪夺了过去，交给解放军战士，杜聿明就这样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319

●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特赦后见到了周恩来总理，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周总理爽朗地笑道：“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老师没有教好。” /326

汤恩伯：郁郁而死

●汤恩伯是从浙江武义乡间走出的农家子弟，陈仪的资助，改变了他的命运 /331

●汤恩伯率部抢先攻入红都瑞金，建公园，命名“犁庭”，意即“平其庭以为田，扫荡其闾以为墟” /333

●南口之战，汤恩伯一战成名，被誉为“抗日铁汉”。汤恩伯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总司令，拥兵40万，号称“中原王”，河南老百姓称之为“水旱蝗汤” /335

●正当汤恩伯一筹莫展之际，收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送给他小令一首，其中写道：“堪爱，堪爱，蒋军进攻必败。” /342

●临危受命，汤恩伯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要职，企图以长江天险保住蒋家半壁江山 /343

●陈仪策反汤恩伯未果，洒热血于宝岛。“卖师求荣”，汤恩伯落下一世骂名。从此门庭冷落，郁郁寡欢，终于患上不治之症 /346

孙立人：幽禁台中

●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孙立人，在军队训练中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国民党其他军队的训练操典，被称为“孙氏操典” /353

●远征缅甸，仁安羌战役，孙立人以少胜多，歼灭1200余名日寇，救出七八千名英美军，名扬中外 /355

●抗战胜利后，孙立人率军进入东北，攻击四平，侵占长春，并先后任东北绥靖副司令、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参与内战 /359

●在蒋介石的眼里，孙立人是一个不可不用但又不可久用的人物 /361

●轰动一时的台湾“孙立人案”，孙立人被幽禁台中30余年 /366

马鸿逵：难回故土

- 军阀世家出身的马鸿逵不断变换着自己的靠山 /371
- 马鸿逵在宁夏实行军阀统治，成为名副其实的土皇帝。为扩充实力，他把宁夏变成一座兵营，每7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马鸿逵的兵 /377
- 基于对马鸿逵的了解，毛泽东对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说：马鸿逵从来就没做过好事，和平解决恐有困难 /382
- 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文化不同，马鸿逵常常掩面而泣，说：“恐怕此生回不了大陆了！” /390

马步芳：病死中东

- 红军西征，马步芳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屠杀、活埋红军战俘，大部分女俘虏被“赏”给官兵做妻妾，余下的红军编为补充团，被迫做苦力 /394
- 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马步芳心惊肉跳，绝望呼喊：“我对得起中央，中央对不起我。”愤恨已迟矣 /402
- 马步芳以武装镇压各族人民，作为维持和巩固其家族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对牧区各民族进行武装袭击和镇压 /408
- 马步芳当了四年“大使”，竟未回台湾述过职 /413

陶希圣：参政不知政

- 20世纪30年代，有心疏离现实政治的陶希圣入北京大学任教了6年，并且创办《食货》半月刊，过着文人的刻苦生活，逐渐建立起了学术地位 /416
- 震惊中外的“高陶事件” /421
- 为蒋介石起草的《中国之命运》，遭到中共痛批 /427
- 晚年陶希圣说：这一生，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80岁有感慨，90岁连感慨都没有了 /429

曾琦：“醒狮”难吼

- 鉴于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曾琦等人决定建立国家主义政党，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共产党相对立，另一方面也试图在中国寻找一条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 /431
- 在民盟中，曾琦领导的青年党比较偏向于国民党当局 /437
- 第三次投票，青年党把选票全部投给了李宗仁，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为此事拍案大怒，大骂青年党“不识抬举” /439
- 流落美国的曾琦抱怨国民党太不争气，于是自己起来鼓动进行一场所谓的“超党派的救亡运动”，但是应者寥寥无几。失望之余，病死华盛顿 /440

张君勱：声哑《自由钟》

●张君勱首次将俄文“Soviet”音译成“苏维埃”，但反对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他挑起科学与玄学论战，被称之为“玄学鬼” /442

●面对抗日悲观论调，张君勱号召全国同胞努力做到三字诀，“一曰死，二曰苦，三曰耐”，抗战就最后能胜利 /448

●1938年底，张君勱发表《致毛泽东的一封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将八路军交给蒋介石，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 /451

●1948年12月，中共公布了首要“战犯”名单共43人，第一名是蒋介石，最后一名则是张君勱 /455

●一生清贫的张君勱，离开大陆后，靠讲学、稿费和养老金为生，晚年继续“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 /461

参考文献 /464

后记 /466

王世杰：离政赋闲

受过蒋介石宠信的、做过国民党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在90寿辰那天，指着自己撰写的《故宫名画百种》和《艺苑遗珍》两书对友人说：“我活了90岁，只有这两点小玩意，算得是我的成功佳作，其他都全无是处！”这位老人在临终时又对女儿留下遗嘱：切不要在其墓碑上刻上教育部长、外交部长这些官衔，就写“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

听其言语，读其文字，人们不难体味到隐藏在王世杰内心深处的那种欲哭无泪的巨大隐痛和悔恨之情。

王世杰受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大法学教授，后任法律系主任。他所撰《比较宪法》讲义，在北大独树一帜

王世杰，1891年生于崇阳县白霓桥回头岭，4岁入家塾读书，于诸生中年龄最小，学业最优，深得业师周芷熙赞许。12岁时，业师力荐其父送他至武昌念书。

在武昌，适鄂督张之洞提倡新学，在武昌城内创办现代式高等小学5所，分东、南、西、北、中5路，招收民间14岁左右的优良子弟为生。王世杰应试时，因年龄小、个子矮，一名姓骆的主考官在接收还是不接收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当即报告张之洞。张之洞摸了摸王世杰的礼帽，问：

“叫什么名字？住什么地方？”

王世杰挺起胸膛：“本人王世杰，家住崇阳县白霓回头岭。”

“这么小，为什么要来武昌读书？”

“为人杰，为尧舜。”

张之洞一惊，批准王世杰报名考试，结果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武昌南路小学。

在南路小学，张之洞批准陪同王世杰念书的家人在校门口摆了个花生摊，以便照顾王世杰的起居。

南路小学3年毕业后，王世杰入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学习3年。其间，与李四光、石瑛、郭泰祺等义结金兰。毕业时（宣统三年），王又以最优等成绩考入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大学。

在北洋大学求学不到一年，武昌起义爆发。王世杰立即投身革命，辍学南归，返回武昌参加起义。王世杰担任都督黎元洪的秘书，参加了守城战斗。并受都督府

委派，圆满完成了“赴湘请师，驰援武昌”的任务。

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王世杰漂洋过海，浪迹天涯。先赴英国进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求学，获政治经济硕士学位。随后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研究法学，于1920年获法学博士。



王世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世杰联络留欧同学，以旅欧中国学生首推代表身份，与留欧学生和华工一同围守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的寓所，力陈利害，阻止签约，使陆使无法出席会议签字。1920年，王世杰又任中国旅欧学生代表，先后赴比利时、意大利，出席国际联盟同志会。同年回国。

1920年冬，王世杰受北大校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之聘回国。任北大法学教授，后任法律系主任。期间，王世杰以其渊博的法学知识和鲜明的教学风格，深得学校同事和学生欢迎。

他所撰《比较宪法》讲义，在北大独树一帜，嗣经商务印书馆印行，立即为全国各著名大学广泛采用。《比较宪法》是我国法学界的奠基之作。另外，王世杰还著有或与他人合著有《增订比较宪法》、《宪法论理》、《代议政治》、《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移民问题》、《女子参政之研究》等一批重要著作。

1922年，王世杰与李大钊等人组织发起民权大同盟。第二年，又与石瑛等人一道发起组织现代评论社。《现代评论》以王世杰为首，以北大的陶希圣、周鲠生、石瑛、王星拱、皮宗石、丁西林等40多名教授为骨干，几乎囊括了当代著名学者，因为他们大都住在吉祥胡同，故被称为“吉祥派”。《现代评论》所撰明快锋利，为传播马列主义、鼓吹民主科学思想、针砭时弊、倡导新政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后来，周健人、林语堂、吴稚晖、胡适、郁达夫、沈从文、李大钊、陈独秀等都热心为该刊撰稿。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王世杰被任命为首任立法委员。同时担任法制局长兼任海口国际仲裁所裁判官。任期中，南京政府颁布的众多“法规”，大都是王主持制订的。如当时谓之为“六法”的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物权、债编、亲属继承法等均是王世杰邀集专家学者草拟、修订的。12月19日，湖北省政府改组，张之洞为省主席，王世杰为政务委员。

1929年2月，南京政府急需人才，决定在原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一所全国一流水平的综合性大学，任命王为国立武大校长。现在武大的校址就是王世杰和李四光圈定的。

王世杰任武大校长，开明办学，治校有方，全国各地名流纷纷报名应聘其麾下。同时，他章法有度，纪律严明，即使是日寇侵占我东三省，武大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抗日时虽言辞恳切，态度坚决，但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勉励和好评，并电告武大。可以说，这是蒋介石赏识王世杰的开始。

创建武大，发展武大，王世杰殚精竭虑，励精图治。他本人认为，武大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

1931年和1932年间，蒋介石调集军队，对鄂、豫、皖红军发动第三、四次“围剿”。蒋介石坐镇武昌、南昌指挥，每周邀请王博士为他讲学一天。蒋、王交往不久，蒋介石即为王世杰广博的知识和精辟的时政见解所动，遂吸收王世杰为自己的咨询智囊。1931年5月，指名王出席国民大会代表。王世杰开始出入官邸内外，为蒋介石服务。他的不少政见被蒋介石重视和接受，受蒋赏识，为日后王世杰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

1933年4月，王世杰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此后，王世杰便步入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1937年8月11日，国民党委员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任主席，汪精卫为副主席，王世杰为该会成员之一。

1938年7月，蒋介石指派王世杰组建中央党政训练班，简称中央训练团，蒋任团长，王任总教官。历时5年，开办31期，受训学员达23000人之多，培训了大量的专门人才。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于1938年设立军事参事室，任命王为参事室主任。这是一个实权极大的官职，有关国共关系、军事、外交、财政、工业、战后复员等重大问题，一般都要让参事室——高级智囊团出谋划策，为蒋介石最后裁决提供重要参考。

王世杰曾两度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担任首任秘书长。他数年置身于最高决策圈，身兼数职。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内治外交方面的卓越才能，翔赞中枢，运筹帷幄，深为最高当局所倚重。蒋介石曾赞扬他：才华出众，功劳赫赫。在蒋介石和宋美龄到埃及开罗参加美、中、苏最高领导人会议时，出于工作和感情的需要，蒋介石指派王世杰以外交官员的身份陪同。

抗战后期，王世杰调国民党外交部工作，后任外交部长，负责对英、美两国的外交事务。抗战胜利前夕，王世杰赴西安与中共和谈

抗战后期，国民党外交部长这一要职一直由宋子文兼任。王世杰为主任委员，负责对英、美两国的外交事务。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在即，可美、英、苏3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背着中国，签署了《雅尔塔协定》这一不合理的条约，以宋子文为团长的代表团先后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直接面谈6次。由于苏联实力强大，中国贫弱，斯大林以老大自居，老谋深算，茹柔吐刚，掂斤播两，既有商人的精明、贪婪，又有政客霸道、奸诈，根本无商谈余地。此时，宋子文已对中苏会谈视为畏途，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兼职，8月，王世杰正式接任这一职务。

以后，王世杰以外交部长的身份，根据蒋介石的授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美通商航海条约》，从此，外蒙古在脱离中国统治20余年的基础上，正式独立。

在抗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最后阶段，蒋介石为赢得全面内战的时间，委派王世杰和张治中赴西安和中共和谈。

当时，在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处境日益明显好转，出现欣欣向荣的情况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再次出现了大溃退，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严重危机。

1944年4月，日军为挽救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近百万大军一触即溃，8个月就失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国民党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不断强化法西斯统治，横征暴敛，以致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民怨沸腾。

在国民党统治区军事、政治、经济危机急剧加深，英美开始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反攻的情况下，美国这时也希望中国能够更多地给日本以牵制，配合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作战。1944年，国民党为了挽救危局，在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共产党的促使下，又恢复了国共两党的谈判。

1944年4月29日，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及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等离开延安，途经茶坊、洛川、耀县于5月2日抵达西安。同日，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等也由重庆到达西安。

5月4日，国共双方代表开始会谈，林伯渠首先提出：请问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提出对我党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究竟如何解决法？王世杰避而不谈这个根本问题，却一再要求林伯渠提出具体问题来谈。林伯渠当即提出，以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演说中所讲的5条意见作为谈判的基础。这5条意见是：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三、承认我党领导下的一切抗日军队，扩编八路军、新四军，发给粮饷弹药；四、恢复新四军番号；五、撤销包围边区之50万军队。王世杰则提议先谈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林伯渠表示可以。在谈军事问题时，他说：经过七年多的抗战，中共领导下的正规军已有47万7千500人，本应全部编成47个师，现在请国民党先给6个军18个师的番号。王世杰认为太多，只允许4个军12个师。这天的谈判无结果，接着又谈了3次。在第五次谈判时双方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经双方代表签字后各自向其中中央报告，请两党中央作出最后决定。

但是，5月11日，当双方谈判记录按军事、陕甘宁边区、党的问题和其他等4项18条整理出来，林伯渠按照双方原先的约定，首先在记录上签字之后，王世杰竟把综合双方意见整理出来的记录说成只是林伯渠个人的意见，而拒绝签字。

5月17日，林伯渠、王若飞和王世杰等人，从宝鸡乘飞机到达重庆。中共南方局董必武、章汉夫和国民党邵力子、康泽等到珊瑚坝机场迎接。苏联、美国、英国的记者和中国《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社的记者也到机场欢迎和采访。在机场，林伯渠对记者提出的许多问题一一作答，并向他们介绍了当前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情况。

林伯渠在重庆住在曾家岩50号。19日下午，他会见了蒋介石。

21日，林伯渠收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共20条。其中明确指出：“为克服目前困难，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起见，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

22日，林伯渠将中共提出的《意见》交给王世杰。王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们所提条件太多，有些条件这样提法，无异是在宣布国民党的罪状，足以使人生气；这20条与在西安商谈的内容不符；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软弱可欺，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正在令有关部门研究西安会谈的材料，准备提出一个提示

案；希望你能考虑修改20条的内容和词句。

林伯渠针锋相对地做了回答。他说：我方20条意见，全文都是实事求是的；西安初步商谈的意见，当时就约定各自向中央请示，并非最后决定；我们只是为了真心诚意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所以才出来谈判，根本说不上欺人；20条意见就是我党中央对西安商谈材料的答复，在这里没有修改的余地。林伯渠与王世杰争辩了两个多小时，后来王世杰托词打电话，到内室密商了半个小时，回到会议室后，将20条意见交还林伯渠，坚决拒收和转交蒋介石。

23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两天来的谈判情况，并对谈判的形势作了估计。电文中说：“我们从延安出发时的一些估计，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了，争取和平已不成基本问题，林彪过去提案已不适合今天情况，照原订之方针反被蒋利用去加强其党内对于一党专政的信心，且作向盟邦粉饰团结的工作。同时，使英美难于说话，使小党派不敢硬挺，使国民党内以孙（科）、邵（力子）为首要求实行民主的力量也不能抬头，对于促进全国团结抗战进步，绝无所获。这种情形，在西安最后数日已稍感觉，到重庆后更为清楚。”6月3日，中共中央复电林伯渠等，同意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及所提出的谈判方针，同时将原提案的20条修改成12条和口头要求8条，指示他们据此进行谈判。

6月4日，林伯渠写信给王世杰。信中说，为了有利于谈判，并表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的诚意，我党中央已复电，将原来所提20条改为12条，而把一些次要问题改为备忘录。

5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王世杰把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提示案》在军事问题上，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在根据地政权问题上，规定把陕甘宁边区的“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根本没有提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关于党问题，要求“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对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释放政治犯等，都只字未提。林伯渠把中共中央修改后的12条意见也递交给王世杰。我党12条意见的主要内容有：“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根据抗日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数，应请政府将中共军队编16个军47个师，每师10000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的番号”；“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战所需要的各项设施”；“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陈潭秋）、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邵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王世杰看了我方的12条意见后说：“此次所提出之12项，项目虽较前减少，但内容并未改变”，“不能接受”。林伯渠据理相争，一定要他们转报国民党中央。王争辩不过，只好收下，但仍声言“不能转呈”。

6月6日，林伯渠写信给王世杰，对国民党《提示案》提出两点声明：第一，

《提示案》与我党中央正式提出的12条意见，相距甚远。但尽管如此，仍愿将《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同时，也要求张、王将我党12条意见转报国民党中央；第二，指出《提示案》开头所说的“以林代表祖涵在西安表示之意见为基础”一语，与西安谈判的经过事实不符。8日，王复信林伯渠说：6月5日所提的12条，因与西安所提“出入太大”，未便转呈；西安商谈记录，“经过林先生增减修改”，也签了字，“所以中央提示案，就以林先生的意见为基础”，希望能够完全接受。

6月11日，林伯渠再次写信给王世杰，信中说对他们8日来函，“有两点甚难理解”。第一，谈判是两党的公事，非个人的私事，我们彼此都是要遵照各自中央的意见去和对方谈判，并将对方的意见详细报告自己的中央，最后得到双方中央的一致意见，才能使问题真正获得解决。今天，你们承认我是中共中央的代表，而又拒绝接收和转报我党中央正式提出的意见，只是片面地要求我个人接受你们党中央的《提示案》，试问我个人如何能作主，谈判又如何能够进行？第二，我党中央所提的12条与西安初步商谈的意见是略有出入，比如编军数目，我首先提出要6军18个师，你们只允4军12个师，我未坚持己见，同意将你们所提的最低限度的数目向我党中央请示，现在我党中央提出的不是6军18个师，而是5军16个师。但是，你们的《提示案》与你们在西安所谈的也有出入，你们原说给4军12个师，现《提示案》又只允4军10个师。当时在西安都曾声明那只是初步交换的意见，不是最后决定，商定各自向其中央报告请示后，到重庆再谈。所以，这种谈判过程中的出入，是双方都有的，是不足为异的。现在彼此所应重视与继续谈的是双方中央提出的正式意见，而你们拒绝转交我党中央提出的12条意见，这是很难理解的。林伯渠在信中最后说，今天全国人民和盟邦人士均希望中国能够实行民主团结，国共关系能够很好解决，以便动员全国抗日力量，配合盟邦向敌反攻，使中国获得自由解放。因此，我党对此次谈判是不惜委曲求全，竭诚求得合理解决。同时，也盼二位将我党中央的12条意见转报你们中央，以利谈判之进行。

6月15日，王世杰又复信林伯渠。信中声称“此次商谈之基本精神，须本统一国家军令政令之原则”。这是国共两党经过将近8年谈判而无结果的真正原因。尽管信中说已将中共12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但是解决办法，仍只能按《提示案》办理，不能变更。

至此，国民党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态度完全暴露出来，谈判遂成僵局。在7、8月间，林伯渠与王世杰又多次会晤和书信往来，但均无进展。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为了推脱造成谈判僵局的责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单方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谈判停顿，中共要觉悟才好。有记者跑去问林伯渠，林为了澄清事实真相，于7月2日答记者问说：国共谈判尚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曾有意见书提交国民党当局，嗣得国民党政府提示案，虽距离较远，但随转我党中央，必要时我将亲自回延安报告，商得具体解决办法，并且表示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促进民主，中共都可商量。

7月26日，梁寒操又发表不合事实的谈话英文稿，谎称在目前谈判中，若干问题已获致解决，以混淆视听。8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谈话指出：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声明阻碍谈判进行的责任，不在我方而在国民党。即使这样，